

中国钱币丛书

甲种本之二十二



新疆历史货币

——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

王永生 著



中华书局

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之二十二

新疆历史货币

——
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

王永生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王永生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8
(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22)
ISBN 978-7-101-05716-4

I. 新… II. 王… III. 金融—经济史—新疆 IV. F8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3883 号

责任编辑:郑仁甲

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之二十二

新疆历史货币

——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

王永生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36 印张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398.00 元

ISBN 978-7-101-05716-4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



作者父亲王传汤（1939-2005）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戴志强

主 编：黄锡全 姚朔民

副主编：顾 青 金德平

编 委：（按姓氏笔划）

王永生 王贵忱 叶世昌 华觉明

汪圣铎 吴荣曾 郑仁甲 周卫荣

金德平 姚朔民 顾 青 高聪明

黄锡全 裘锡圭 戴志强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缘起

近年来，随着我国钱币收藏、研究活动的日趋繁荣活跃，广大读者对钱币学著作的需要也日益提高。读者既需要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也需要深入浅出的普及性读物。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中国钱币学会准备编辑一套反映当代钱币学水平的《中国钱币丛书》，中华书局也拟出版面向广大读者的《钱币丛书》。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协议合作，并邀请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共同编辑出版《中国钱币丛书》，以飨读者。

《中国钱币丛书》分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甲种本为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力争反映当代钱币学的研究成果。乙种本为高质量的普通性读物，力争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中国钱币丛书》的编辑，尚无经验，在构思选题以及其他方面，必然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期望泉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合作与支持，以便能把它办得更好，更能反映当代的学术水平，更能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4月

说 明

1、本书所收入的 923 枚钱币实物照片，凡未标注尺寸者，均为原大；凡非原大者，均标注尺寸。

2、除编号图 439、652 为拓图外，其余钱币图片全部为实物彩色照片。

3、用于拍照或扫描的钱币实物，多由泉友提供。为满足个别泉友要求，未能在每枚钱币后具体注明提供者，只能统一在后记中致谢，谨请更多的钱币实物提供者和读者谅解。

序

大约30年前，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白寿彝先生上课，十分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样一种观点。那时汉族正统史学观念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初听之颇不以为意，以为不过是一句口号，因为先生自己是回族，格外强调罢了。但是这绝不仅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是先生对中国历史最深入的理解。白先生晚年做的最大也是最后一项工程，就是花20年功夫主编了22卷本《中国通史》，并且亲自动手撰写了第一卷《导论》。《导论》开篇第一句就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先生的这个思想，贯穿在他的整部《中国通史》中。而我是在后来的工作和研究中才逐步地理解了这个思想，而且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多方位、多层次地，以喜乐汗水、恩怨情仇、笑泪血火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当然，其中也必然包括钱币文化。了解这个过程，深入地解剖和认识这个过程，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和钱币工作者的历史任务，也是金融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的现实任务。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我们常说，在世界各大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不断的。这话不错，也是我们的骄傲。但是，由于中国历史整体上是汉文化为主导的，在民族问题上，我们3000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不全面的，有时甚至是带有偏见的。历史的隔阂，思想的偏见，使得文献记载也并不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重新挖掘和检讨历史，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劳动。在历史货币的研究领域，同样如此。

中国传统史学，历来以文献为圭臬。甚至可以因对同一文献的不同见解，而构成一段学术史。自王国维利用出土甲骨证实先商历史以后，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遂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当时王国维所谓的“新材料”，主要是指甲骨、青铜、流沙坠简、

敦煌卷子。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和文博事业的发展,二重证据中的“新材料”,比起王国维的时代,早已大大丰富了。不仅包含了出土的文物,也包括传世文物,甚至过去不视为文物的社会生活物品、乃至社会现象等等,也纳入了历史材料的眼界,其中就包括钱币。

钱币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起源不晚,实用性却远不及西方。在中国的古代,由于史学记载相对完整,文化器物的史料作用大大低于文字记载。钱币的币面文字又大多已见于史载,相对于甲骨、青铜铭文、简帛、文书之类,承载的信息量似乎太少,大多不足为贵,因而古代的钱币学主要是文人的清玩之举。当中国的早期钱币学著作已经在文人雅士中传抄赏玩时,欧洲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探寻文化的曙光。但是自欧洲商业资产阶级兴起后,小国寡民的多种钱币兑换和折算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和技能。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的科学界更对新“发现地”的历史研究倾注了极大热情。这些“发现地”,往往历史资料残缺,而留有鲜明时代印记的钱币,则成为历史的重要佐证。所以欧洲钱币学伴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钱币学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养分。

在中国,其实也存在着这样一片“新”的发现地,即大西北的新疆。之所以在新字上还要加一个引号,是因为新疆自汉代以后,长期处在中央政权管理之下,是中国的“旧”土。但元末蒙古退出中原以后,北方少数民族一直以北方草原和西北为活动地域,与明朝对峙。直到满族入关,平定准噶尔,西北重新回到中央怀抱,中原与新疆已经隔绝300多年了。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走出了“中世纪”,俄罗斯也开始向远东扩张。时代的隔膜、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压力,推动中国的学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西北的潮流,当时称“西北史地之学”。初期的西北史地学者,如洪亮吉、祁韵士、徐松等人,因谪戍边疆,重在考察西北地理和民族民风。后来的学者,因为边事日紧,更注重证史,特别是蒙元史,用以资治。但他们又大多没有去过新疆,魏源、龚自珍、张穆、沈曾植、何秋涛等人虽然也有著作流传,却又多是从文献到文献。

第一个跳出了中国史料的视野的是洪钧。洪钧是同治戊辰科状元,原就属意蒙元史和西北史地之学,1887年出使俄、奥、法、荷四国,在欧洲访得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和欧洲名著多桑《蒙古史》,并用以校订《元史》,著成《元史译文证补》。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诟病《元史》者甚多,动手校订甚或重写的也不乏其人,但几乎无人知道,在中亚西亚还有一些重要的蒙古史料。在欧洲,也早有人利用世所不易见的波斯文史料和阿拉伯文史料写成了蒙古史。在采用境外资料证补中国历史方面,洪钧是开史学新方法的第一人。

除此之外,洪钧还注意到,西方史家非常重视钱币资料对史学研究的意义。在广搜蒙古史料中,也搜集了以大英博物馆所藏为主、兼及德国博物馆藏品的蒙古钱币资料,

数量多达600多枚。他请他的随员陈其镛翻译出来，又与蒙古王统相对照，写成《蒙古西域诸国钱谱》。《蒙古西域诸国钱谱》对钱币的描述已经具备现代科学描述的基本要素，有编号、币材、成色、重量、铸主、年代、形制、图案、币文、铸厂，还简述了金帐、窝阔台、察合台、伊利诸汗国王统，排出蒙古诸汗和后裔的世次表。中国古代的钱币学，关注的热点基本上集中于中原民族，对周边民族始终不甚了了。《史记》《汉书》对中亚钱币的记叙还是来源于亲眼所见，到宋朝的钱谱，对外国钱的记叙也是抄袭而已。明朝徐象梅为《泉志》外国钱所作图形，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洪钧此书为钱币学与中国历史学的联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可惜的是，洪钧弃世很早，书稿并没有完成。《元史译文证补》和《蒙古西域诸国钱谱》都是由后人整理完成的。前者由陆润庠于1897年整理出版，后者直到1911年才由当时著名的报人和出版家汪康年组织整理出版。由于是别人从翻译手稿整理而成，这本《钱谱》只有文没有图，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民国以后，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钱币学出现了一个高潮，对中原钱币的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对边疆民族钱币的研究，却仍然没有太大的进展。

然而正是在清末民初，西方的学者开始随着资本的扩张大批来到中国的边疆地区。1865年，浩罕军阀阿古柏入侵新疆，占据大片土地达12年。阿古柏向英国女王和俄国沙皇写信求助。1874年，英国派福赛斯爵士携女王信和各种赠品、武器到新疆与阿古柏非法订约。英国代表团沿途收集中国文物，其中就有和阗马钱。这是这种从不为人所知的钱币第一次面世。1905年，德国盗贼式探险家勒柯克第二次新疆探险，发现了一种粟特文钱币，以后，这类粟特式文字钱币在苏联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不断发现，并被苏联学者考定为突骑施钱币和回鹘钱币。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日本《东亚钱志》登载，这些钱币才为中国学者知晓。1907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遣科兹洛夫探险队到中国西北，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子发掘，除掠走了整整一座佛塔的西夏文卷外，在黑城商业街遗址发现60张元朝纸币。民国后，有人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参观时，拍下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被罗振玉收入《四朝钞币图录》，才为国人所见。国势日衰，边事日蹙，边疆民族的钱币研究更无从谈起。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已经成立，文化走向恢复的时候，彭信威先生所著《中国货币史》，煌煌近千页，洋洋70余万字，涉及边疆民族钱币的内容，竟不到10页。

中国钱币学会1982年成立后，很快意识到钱币研究的这一欠缺。1985年，学会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少数民族钱币研讨会，揭开了学会对边疆和周边民族钱币研究的序幕。紧接着，1986年在乌鲁木齐成立了学会少数民族钱币研究会，1990年在珠海成立东南亚货币研究组，在敦煌成立丝绸之路货币研究组。实际上在此之前，新疆的钱币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和整理新疆钱币资料。1986年在乌鲁木齐召开少数民族钱币研究会成立大会时，新疆钱币学

会办了一个新疆历史货币展览。尽管还是初步成果，已经令到会的全国各地学者惊诧不已。以后的研究进展是惊人的。仅仅过了5年，1991年，新疆钱币学会编辑出版了彩色印刷、中英双语、图文并茂的《新疆钱币》一书。这本书上起西汉，下迄1949年，第一次为新疆钱币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为钱币界和史学界以史论币、以币证史提供了一个基础的资料，一出版就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这个成果还是初步的，但是这本书的编辑和成书过程，却推动了新疆地区和新疆以外的爱好者和学者研究、搜集、收藏新疆钱币的热潮。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也为新疆钱币的收藏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宋人说，“势隆治极之际，地不爱宝”，虽是谏颂之词，但在新疆确实出现了珍贵钱币不断出现的局面。上世纪70年代，香港还有收藏家卖屋以求红钱的故事，到90年代，流入境外的红钱竟以麻袋论。当然，爱好者、收藏家和学者对待钱币的态度是不同的。爱好者往往求其全，希望能够收到各个时期的代表性钱币；收藏家则以版别稀见为贵；学者固然希望见到新的发现，也更重视从哪怕是普通品中发现历史意义。无论为了什么，学者、爱好者和收藏家的活动，都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新疆钱币的认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成果的丰富、收藏研究队伍的扩大，新疆钱币的认识又到了一个总结成果的新阶段。王君永生适时写出了他的新作《新疆历史货币》。

永生君出生在伊犁，幼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朋友为伴，能维语，及长就读于新疆大学历史系，对家乡的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情感。毕业后进入新疆钱币学会。永生是幸运的，进入钱币学会不久，就赶上参与学会编纂《新疆钱币》一书。从那时开始大量接触新疆钱币，求教于高校、社科界和社会各方面的学者、专家、收藏家，同时跑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90年代以后，永生君来到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更有机会接触全国各方面的学术动态。大学毕业至今已近20年，长期的积累为深入研究新疆钱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因为出身于大学历史系，作者研究钱币有一个很好的视野，他并不孤立地看待一枚钱币，而是始终把钱币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去。又因为长期从事钱币研究，并不轻看实物。近来人们常喜说“细节决定”，虽不是必然的，但细节确是往往规定着我们对事物的最终认识。以钱币之细微，却可以小中见大，看到大的历史。比如唐朝有两种钱币“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史书没有正式记载，但泉家却早就偶有发现。只是看到这两种钱风格与一般唐钱迥异，而且发现地多在西北，颇为不解。作者查阅史书，又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这是由于天宝年间安史之乱，西北主力东调，造成西域与中央隔绝，孤悬治外的安西都护府为坚守国土、安定社会，自行铸造了这两种钱。透过这小小的钱币，映照出了那一段宏阔的历史背景，也看到了在那历史背景中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古代将士维护国家统一的艰苦图景。又如俄国卢布和戈比，原是外国货币，与新疆两不相

干，即使在新疆有所发现，人们也往往不把它作为新疆钱币看。作者却把它纳入曾经在新疆流通的钱币，因为1871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期间，沙俄也曾趁机入侵伊犁，在伊犁实行殖民统治，用俄国卢布掠夺中国的人民和资源。又由于伊犁密迩俄国，顾虑沙俄觊觎，所以伊犁在新疆收复后没有采用全疆流通的红钱却使用内地制钱，两种钱币交代清楚了一段新疆与祖国关系的历史。

此外，作者充分归纳了近年来新疆钱币收藏家和研究者的意见，在不少地方也提出了自己的创意和见解。像“高昌吉利”钱，200年来，人言言殊，大致以推测为主。作者认为“吉利”是突厥语“额利发”的意思，这枚钱币是麹氏高昌周旋于唐朝中央和突厥之间的产物。见解新颖，有一定依据，可作近年较有分量的一说。叶尔羌汗国是16到17世纪南疆的重要汗国，其钱币长期以来不能确认。1993年我们考察丝绸之路新疆段钱币，专程赴莎车调查，仍无所获。作者集中了一些新疆钱币收藏家的新资料，归纳了新疆钱币研究者近年来的意见，基本确认了叶尔羌汗国钱币，是新疆钱币研究的一大进步。类似可圈点之处还有，不胜一一枚举，读者可以自己体会。

本书副题为“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阅读全书，我的体会是名副其实，新疆作为广义西域的东部，因为地理、人文和历史的因素，成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部，两种文化在这里融合有着天然的条件。从新疆的钱币来看中华文化，更可以看到在西部这片土地上，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过程。也更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源性和多元性。认识这一点，是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基础；是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对世界采取开放、包容态度的基础；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钱币的意义所在。

2007年元月 于繁简居

读《新疆历史货币》有感

新疆史称西域，早在汉代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号为“西域三十六国”。张骞通西域以后，新疆成了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形成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西域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人类进入航海时代以后，西域文明逐渐走向衰落，最终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中外考古探险家纷纷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访古寻宝，西域文明终于被重新发现。人们很难想象，人迹罕至的中亚荒漠，竟然有过如此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正如南唐后主李煜诗中所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新疆考古不仅重新发现了西域文明，而且发现了无数丝绸之路上的古国的钱币。这些古钱币往往是我们解读西域文明之谜的一把钥匙，因而倍受中外学者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逐渐走向正轨，和其他领域一样，中国古钱学界不断涌现新人，本书作者王永生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如果从1988年新疆大学毕业分配至新疆钱币学会算起，他在新疆古代钱币研究领域已经辛勤耕耘了18载。他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西域钱币研究事业。我面前这部长达60多万字的书稿——《新疆历史货币》，便汇集了作者多年来呕心沥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新疆历史货币》正如副标题“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所揭示的，该书讨论的时间范围，从公元1世纪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铸货币汉佉二体钱，直至1951年发行的背印维吾尔文的人民币。作者对这两千多年间新疆地区历史上铸造或流通的货币，从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视角，进行了系统的考释，全面分析了新疆地区两千多年间货币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就我所知，如此博大精深的西域古钱币专著，这还是第一部。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非我所长，是否有重要发现，不便妄加评论，需由博雅之士进行评判。这里只能就我本人所熟悉的一些问题，如“高昌吉利”钱、“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准噶尔普尔”钱等谈一点感想。确实，作者在上述问题上都有令人信服的考证和重要突破。作者以实物资料，解决了民族史、西域史和中亚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疑难问题，填补了学术空白，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之作。

“高昌吉利”钱币堪称西域名钱，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皇家金器窖藏中发现过1枚，与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日本钱和同开珰共同出土，足以说明此钱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竟然无人通晓这枚古钱上铭文的真实含义。作者首次正确指出，高昌吉利钱铭文之“吉利”并非来自汉语“吉祥如意”，而是来自突厥语官衔“颉利发”，是西突厥册封给高昌王的封号，与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文化特点有关。作者还进一步指出，高昌王国文化，是由汉族移民带来的农耕文化，而环绕王国四周的，则是以突厥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高昌吉利钱币考》，《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是大名鼎鼎的唐代名钱，而五代以来人们一直不知道这两种钱币产自何方，竟然成为困惑古钱学界的千年不解之谜。作者根据新疆考古新发现，有力地论证了这两种唐代钱币实际上是在西域铸造的，另有别品“中”字钱和“元”字钱等，全都是唐代安西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为坚守西域的唐军在大历、建中年间于安西（今新疆库车）铸造的，属于最早的军用货币，并非私铸，流通使用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区，即库车及其附近地区。借助出土钱币所提供的线索，作者还就上元元年（760）以后唐朝在西域的坚守情况及吐蕃攻取西域的路线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中国钱币论文集》第3辑）。这个重要发现受到法兰西学院教授张广达先生的高度评价，并被日本东洋铸造货币研究所《方泉处》季刊第19号（1997）全文转载。

“准噶尔普尔钱”是北疆的准噶尔蒙古汗国于17世纪末征服南疆的叶尔羌汗国后在叶尔羌城（今莎车）打制的一种金属货币。尽管文献有所记载，但是不见图样，钱币两面文字似与文献记载略有出入。作者对此详加考证，首次正确指出其中一种文字是察合台文，而非文献所谓托忒式蒙古文，订正了文献记载之误，纠正了国内外很多古钱币著作对此类钱币的错误分类。同时，作者还结合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汗国侵扰西藏事件，就西藏使用普尔钱的记载以及黄铜普尔钱的来历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中国钱币》1990年第1期）。

除新疆（西域）钱币之外，永生在波斯（伊朗）仿照元朝使用纸币、西藏“色章郭木”金币等研究领域，均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国是最早发明并使用纸币的文明古国，纸币在元代首次传播到波斯地区。作者全面整理了庞杂的元代史料，并结合中外文献，首次论述了蒙古人在波斯建立伊利汗国时期，曾经仿照元朝纸币制度于1294年发行了波斯纸币。这是我国古代纸币文化及印刷技术传入中亚进而传入欧洲的明确记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至波斯语中至今仍将纸币称作Chao（钞）（《论波斯伊利汗国仿行元朝钞法》，《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

令人叫绝的还有作者对“色章郭木”钱币的研究。色章郭木是西藏地区1918—1921年

间铸造、使用的一种金币，限于资料，关于该金币铸造、使用及其停铸原因，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金币是西藏上层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为从事“藏独”而铸造的。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中国钱币珍品系列之一种色章郭木金币纪念章，曾有群众来信提出异议，为此国家一些部委亦去专函询问。永生受命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草拟复函，给以圆满答复。为了澄清错误认识，他还专门写了《色章郭木金币考》（《中国钱币论文集》第4辑），通过对铭文、图案、纹饰等的考释并结合文献资料，特别是当时直接参与铸币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的记载，证明该金币不但和“藏独”毫无关系，而且是本世纪初西藏地方政府为抵御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日益渗透而铸造发行的，具有强烈的抵御外来入侵的爱国成份。因此，这篇文章所表现的不仅是简单的学术研究，同时还表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高尚情操。

永生的研究还有许多重要贡献，以上数例足以表现作者在历史学、钱币学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力。

永生1988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长期生活在新疆伊犁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及其文化、宗教背景比较了解，并熟悉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这为他从事新疆（西域）等少数民族文字钱币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与永生初识于1991年10月，当时我在新疆考察，适逢全国第二次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我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专题报告。他当时负责筹备会议，我们因此相识，会后曾一同去他家乡伊犁考察而成为挚友。1992年2月，他被借调到北京参与中国钱币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早在1992年，他就被新疆人民银行破格评了中级职称（经济师），后因工作调动（1995年正式调入北京）及历史学与金融系统分属不同领域而受影响，致使他在西域及中亚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许多重要学术成果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一位科学工作者，一生若能有一个发现，或取得一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就不算虚度人生，足以告慰国人和家乡父老。受工作调动和银行系统评审体制的影响，永生如今还只是副研究员。在我们这个“无错不成书”的时代，《新疆历史货币》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足以让那些沽名钓誉的所谓“教授”和“研究员”们汗颜。

永生希望我能为本专著写序，我本人从无点评别人研究的习惯，但是永生的研究确实有许多过人之处，我愿意破例谈一点读《新疆历史货币》后的感想，是以为序。

2006年8月19日于京城蓝旗营寓所

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钱币学力作

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集十多年积累，经过不懈努力，撰写完成了《新疆历史货币》一书。全书图文并茂，65万多字，收录的钱币实物有900多枚，包括了两千多年间新疆本地铸造和流通使用的货币——从公元1世纪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铸货币“汉佉二体钱”到1951年发行背印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另外，附录中还收入了新疆地区出土发现的中原货币和外国货币。钱币照片绝大部分为原大尺寸，彩色印刷，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在已经出版的新疆钱币专著中，无论是资料收集还是考证论述都最为全面和系统。关于这部学术专著在钱币学、中外文化交流史、新疆地方史等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当代著名钱币学家、《中国钱币》杂志主编姚朔民编审和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两位专家在序言中已有具体评述和介绍。这里，我想就研究新疆钱币的现实意义谈点读后感想。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自汉朝建立西域都护，新疆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后，就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近代以来民族分裂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混淆视听，制造和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因此，从历史上阐述清楚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就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一项重要工作。而钱币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在说明新疆与祖国内地关系方面具有更直观的、一般文献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钱币作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内容，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更是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发展的缩影，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新疆历史货币》一书正是从这一视角通过钱币这一历史的见证，客观地揭示了历史上新疆作为地方政权与祖国历代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指出的：

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铸货币“汉佉二体钱”的记值单位，使用中原地区传统的货币重量单位“铢”，就充分证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新疆地区与内地因商贸的关系而连为一体，货币文化上与中原地区一样同属东方货币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龟兹国铸造的“龟兹五铢”钱及小铜钱、麹氏高昌王国铸造的“高昌吉利”钱、